

目 录

我与广东空軍.....丁紀徐 (1)
(白衛紀录整理)

从蔣、余矛盾說到广州弃守.....李洁之 (21)
(白衛、逊魔整理)

蔣介石捉放莫希德李洁之 (46)

西南反蔣的回忆罗翼群 (50)
(白衛紀录整理)

陈济棠勾結美帝与垄断广东糖业馮 平 (72)

陈济棠搞“軍垦”与元老派的暗斗
.....柳乃斌、柳譚人 (83)
(遺稿, 清若整理)

“广东中央銀行香港分行”筹設記要叶少华 (87)

陈济棠、林翼中操縱党务、参議會
和民众团体述要柳挺生 (93)
(遺稿, 金重、清若整理)

李汉魂封金挂印与余汉謀回粵倒陈胡銘藻 (113)

关于余汉謀投蔣倒陈的补充資料卜汉池 (123)

“张黄事变”前后的粤局……………凌仲冕（127）

“张黄事变”前张发奎在香港

拉攏軍閥余孽的勾当……………林志鈞（135）

汪精卫投日前后侧纪……………陈曙风（139）

关于抗日时期蔣、余、李在广东

卖鴉片的記述

蔣介石独吞烟土不遂改为“外銷”……………郑应时（146）

余汉謀、李汉魂爭夺承銷利益……………卜汉池（148）

防軍、恶霸、承銷分肥……………凌仲冕（152）

短 稿两則

陈济棠玩弄的“效忠宣誓”……………刘紹武等（45）

陈济棠在广东办实业的意图……………林扬永（92）

我与广东空军

丁紀徐

广东空军是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原来有其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期间，广东的革命政府得到苏联的援助，继建立黄埔军校之后，于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大沙头成立了广东航空学校，初办的一二两期都是由黄埔军校选送学生入校训练。那时苏联接受我革命政府要求，除了供给飞机弹械之外，还派来航空教官协助我们加紧培养空军人才。一九二六年秋，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北伐军总部开始成立了航空处，广东空军在北伐战争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大革命摇篮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可是，自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广东空军在蒋的操纵下，便从革命武装转变为反革命武装，长期以来，一面参加了反人民反革命的“剿共”战争，一面又卷入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互相厮杀，成为军阀官僚的内争工具。十年间（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七）我个人在广东空军历次重大事变中都被捲进漩涡，而且成为主要角色之一。当时长期为反动派所利用，脱离人民，迷失方向，至今思之，犹感愧痛。以下，根据个人过去的一些经历和见闻，着重谈谈广东空军从拥蒋到反蒋，又由反蒋到投蒋的波折过程。

内战倾轧，投奔南京

先从个人投身广东空军的经过谈起。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剛由歐洲德、法兩國學習航空技術畢業，返抵香港。由於過去我國航空人才極少，加上當時正值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回到廣州不久，就被任為廣東航空學校少校飛行教官。一九二七年二月，廣東革命政府北伐軍的航空處（當時處長為林偉成）選送了一批飛行人員到蘇聯深造，我也在被選送之列。剛巧陳濟棠（時任第十一師師長）和林翼中（十一師政治部主任）也到蘇聯考察，大家在旅蘇期間，常有來往，彼此之間結下了一段交情。我在蘇聯學習了十個月。十二月上旬由蘇聯回到廣州。那時蔣介石已叛變革命，在廣東空軍內部，林偉成和張惠長兩派鬥爭激烈，我對林有意見，因而沒有回航空處報到而跑到香港和張惠長派的人物有所勾搭。抵港第二天就發生了廣州公社起義。一九二八年春，廣州又被反革命勢力重新控制，我便回去航校當飛行主任。那時林偉成已因風潮辭職，張惠長繼任第八路軍航空處處長，周寶衡為廣東航空學校校長，以後張惠長到各省作長途飛行，航空處處長職務交由陳慶雲代理。陳委我當航空隊的副隊長（隊長胡錦雅，那時航空處所屬空軍只編有一隊，黃光銳亦為該隊隊員之一）。張惠長和陳慶雲都是中山人，在政治上屬於孫科的“太子派”。我初時曾擁護張惠長反對林偉成，有一次，張要非法在航校報銷汽油四萬元，由於我是飛行主任兼機務主任，按規定要經過我的簽章才能報銷，張要我照辦，我不肯負責，因此大家鬧得很不愉快。那時原定由我率領五機到各省作長途飛行，報上也宣傳我們即將出發，張惠長此時卻撤換航校校長周寶衡，而自兼校長，我和周寶衡平時感情較好，因此就和一批同情周的教官、學生、和飛行員掀起了一个反對張惠長的罷飛罷課風潮。我原來已奉令出發作長途飛行，至此也臨時退出。那

是一九二九年冬的事。是时张惠长已发表为南京中央的航空署长（属军政部），但仍兼长八路军航空处和广东航校。他认定我是这次风潮的主角，因此便向南京中央告状。有一天林翼中（自一九二九年春李济被蒋介石扣留，陈济棠接任八路军总指挥后，林虽转搞党务，但与陈关系极密，有“文胆”之称）忽深夜来访，据说南京中央已对我下了通缉令，林劝我速离广州暂避。第二天我便跑到香港去，那时航校和空军中参加反张风潮的教官、学生、飞行员大约有一百多人，大部分也先后跟我跑到港、澳。南京对我的通缉令不久就在报上发表，理由是鼓动风潮，反对上级，违抗军纪。我在港住了好几天，便秘密回广州见当时的广东省主席陈铭枢诉说不平，他没有谈出什么解决办法；我又转到梧州找陈济棠，陈济棠却表示愿意负责把问题解决，但劝我把这一百多闹风潮的人员拉回来，又送我四千元旅费，叫我到南洋一带走走，避过风头。我后来并没有去南洋，只到了澳门暂住。那时正值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打中原大战，李宗仁、张发奎等也和陈济棠打粤桂战争。为了要加强内战实力，冯玉祥和张发奎都曾派人到澳门找我，想把我們这一批人员拉过去，作为他们建立空军的骨干。蒋介石和陈济棠获知此事，便开始有点着急。为了解决这一次持续了几个月的空军风潮，陈庆云奉宋子文命到澳门找我谈判，记得谈判地点是利为旅酒店。陈传达宋子文意见，劝我们到南京去，我们都坚持以张惠长下台为条件。最后陈说宋子文已准备在财政部税警总团成立航空队，欢迎我们参加。于是我便到上海见宋子文，这是我和宋子文发生关系的开始。那时，据陈庆云方面通知，宋子文已打算派我为税警总团航空队长，我们这一批闹反张风潮的人员已陆续在南京集中，但后来事情

有了变化：据说宋子文的建立税警总团航空队的计划没有得到蔣的批准，因此陈庆云又来劝我们到南京航空署工作。本来我们反对张惠长，那时张是署长，又回到他下面工作是很不服气的；但风潮拖了那么久，闹下去问题很多，而且大家已到了南京，结果只好答应。那时，中原大战激烈，我们也奉命先后参加泰安、济南各次战役。后来空军移防螺河，蔣介石到前方督师，也几次坐我驾驶的飞机视察阵地，我因此和蔣也有了接触。閻、馮失敗后，我们又回防南京。这时候，我和张惠长之间的关系逐步好转，蔣介石也对我們广东空军人员很注意，我被提升为空军上校，任南京空军第六队副队长（队长是周宝衡）。

宁粤分裂，歧路傍徨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报载蔣介石扣留胡汉民于湯山。那时宁粤关系逐渐紧张，传说古应芬、陈济棠等在广州要发动反蔣。四月下旬，南京政府召开的全国航空会议刚刚闭幕不久，张惠长忽秘密离京赴港。当张未走之前曾在闲谈中对我慨叹说：“我们广东人在南京工作也实在不容易，空军内部江浙派一天天得势，恐怕结果非被他们排挤掉不可！”张离京之后，他的秘书伍頌祺通知我说：“张署长已到香港了，目前广东空军人员都已准备走，广东已发动反蔣，我们广东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主意。”他还把张惠长临走前签下的一道命令交给我，内容是要我立即率第六队飞江西吉安候命。伍頌祺又嘱我绝对保守秘密，还约好到上海后和我联络，要我在接到“买瓷器”（当时和伍约定的起事隐语）的电报后，即率领全队飞机飞回广东，有可能时还希望我策反其他机队。我当时同意接受任务，第二天便率第六队全队飞机十架

逕飞吉安集中。那时第六队队长周宝衡和第四第五两队的飞行员二十多人已随张惠长先后离职回粤。起先我确也打算飞走，但到达吉安后，回粤信念发生动摇，因此当伍来电之后，自己踌躇了几天还下不出起事飞粤的决心。这时候忽接宋子文来电，要我“即飞南京有事商量”。同时接宋电报的还有另一队长刘芳秀（福建人），宋还叫他和我一同回南京。我接电后心里有点不安，怀疑已受监视，结果只好和刘一同飞返南京。

抵京的当天晚上，我到宋子文的陵园别墅见宋。当时宋正和几个美国人在打扑克牌，见了我便引我到他的书室谈话，他的随从秘书陆文瀾初时也在座，不久陆退出，室内只有我和宋子文两人。宋子文问我知不知道空军方面已发生逃跑事故。我答并无所闻。宋又问我：“张惠长已走了，你事前知道吗？”我又答说不知。宋子文又告诉我：广东飞行员先后离职走了不少，希望由我设法稳定那些还没有走的广东飞行人员，使他们不再逃走。宋子文当时拿出一张十万元大洋的支票，叫我收下作为对广东空军做工作的联络活动费用。宋又说：“张惠长走后，已电邀黄秉衡回国接任航空署长，将来可派你任副署长。”我当时觉得当副署长不错，就决心留下来，但又感到对联络工作并没有把握，接了宋的钱，联络不成反为不美，因此没有接受那张十万元支票。我对宋子文说：“不要过于重视那班人，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好了。”接着又自告奋勇地说愿负责训练飞行员工作。宋听了很高兴。我建议向德国购买“容克”式战斗机（可作轻轰炸机使用）两队，并告诉宋子文，我认识那家德国飞机公司驻南京总代理，可以立刻看到该式飞机的真样。宋就叫我负责办理，以后我按计划向那德国商人买了两队“容克”式飞

机，并负责主持当时航校的一个毕业班（三十人）的飞行训练。那时候，我感到宋子文对自己很信任，颇有长期留南京的打算。

训练工作搞了大约不到一个月。有一天，我的爱人（还有一个张惠长的家人陪同）忽由广东来队部找我。她带了一封陈济棠、张惠长、陈策、陈庆云等联名的密信，劝我回广东参加反蒋，并希望我把留南京的广东空军人员尽量拉拢回粤。我接信后思想很矛盾，一方面觉得和宋子文关系弄得不错，留京工作有了靠山；另一方面又觉得在广州旧朋友多，生活上也比较来得习惯，加上爱人也极力主张我回去，结果还是最后决定秘密离京。为了掩饰各方耳目，我一面暗中买好了车票船票，一面请航空署的一些同事吃饭，扬言已把家眷接来南京居住。事实上，席散之后我便立即搭车到上海去，和伍颂祺接洽之后随即搭船回粤。这是六月上旬的事。留在南京的广东空军人员获悉我走之后，也陆续秘密离京回粤。

宁粤合作，陈张斗争

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我回到广州，那时汪精卫、孙科、古应芬、陈济棠等已开过非常会议，在广州宣布另立国民政府，和南京的国民政府唱对台戏。空军和海军也分别成立总司令部，直轄于广州国民政府。亲孙科的张惠长和陈策分别任空军和海军总司令。广东空军原来隶属陈济棠的八路军总指挥部航空处，反蒋前由黄光锐任航空处长。空军总司令部成立后，广东空军便脱离陆军而独立。（总部下成立了两个大队司令部，黄光锐为第一大队司令，胡锦雅为第二大队司令）。这一做法对陈济棠来说，完全是为了装点反蒋的门面

而作出的表面措施。实际上陈一方面积极把原来亲张惠长的黄光锐拉过来，并通过他掌握着原属八路军航空处的空军班底；另一方面又利用我和张惠长之间的矛盾，由他哥哥陈维周和林翼中出面对我特别拉拢，通过我把一部分回粤参加反蒋的空军人员从张惠长手下拉过来。这样，张惠长虽然名义上当了总司令，他实际上能抓到的空军实力也有限。过去八路军航空处之下有三个机队，到了空军总部成立后，扩充为五个机队，我被委为第二队队长。

空军总部成立以后，由于张惠长在政治上有孙科作后台，又有孙系人物陈策控制下的广东海军相呼应，自己又摆老资格，因此，就逐渐和陈济棠发生磨擦。陈济棠为了要对付张惠长，对于曾反对过张的周宝衡和我都积极拉拢，周宝衡还获得了粤海关监督的肥缺。那时陈维周和林翼中经常找我，鼓励我对空军人员多做联络工夫。记得陈维周和林翼中都曾对我透露陈济棠有意要我负责空军，我听了他们的话以后曾找周宝衡商量，并主张最好由周出来负责，自己资历还浅怕担当不来。周说他已当了海关监督，大家分头发展好了，还力劝我不必顾虑，如成事实，他也大力支持。但这事情一度谈过之后就没有下文了。

陈济棠和张惠长的第一次尖锐冲突是发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粤四全大会时期，那时陈济棠鼓动大会代表提案反对宁粤上海和谈关于中委选举问题的协议，和孙科发生意见冲突，结果孙科派一度退出了大会。在这争执过程中，张惠长、陈策等在孙科指使下，一面叫空军、海军代表不附议陈派的提案；另一方面，在孙科派退席后，密令海、空军分别在虎门和唐家湾集中，向陈济棠进行威胁。当我接到张惠长要我全队飞唐家湾的密令时，我立即去第一集团军总部见陈

济棠，陈引我到他的休息室密谈。陈显然事前没有估计到张惠长会出此一着，他听我报告后，在室内踱来踱去，半晌不语。最后他对我说：“张还是总司令，他叫你们去就只管去，但要好好掌握机队。到了唐家湾有什么变化，即来电告知我”。我辞出前，陈济棠给我一本电报密码，还约好以一家十三行的银号为收电地址。我就照陈的指示，表面上执行张的命令，率机队飞唐家湾。以后由于粤四全大会的纠纷解决，空军和海军也分别回到原防。但经过这一回海、空军的联合示威，陈济棠和张惠长、陈策之间（实则是陈济棠与孙科间）的关系就更加恶化下去。

粤四全大会闭幕以后，出现了所谓“宁粤合作”。一九三二年一月，广州的国民政府宣告撤消，西南两机关同时宣布成立。那时孙科已到南京出任行政院长。本来张惠长一向主张扩大空军组织机构，把原来南京军政部的航空署扩为航空部，梦想自己当上航空部长。早在全国航空会议时期他就在南京散布这一主张，但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这一次由于孙科上台，张惠长就满怀希望积极活动。有一天，我到陈济棠家坐谈，陈济棠对我说：“张惠长活动成立航空部，想搞空军归中央，我过去花了不少心血培植起广东空军，张惠长如此搞法实在混账。如果蒋介石独裁已被打倒，国家真正统一，归中央倒无所谓，但实际上蒋势力还在，张这样做就等于把空军归蒋介石私人，这怎么行呢？”陈说话时很激怒。我当时极力附和陈的见解，还引用外国为例，说：除法国设有航空部之外，其他英国、美国、意大利都是把空军归陆军或海军指挥的。中国空军只有一百几十架机，并无设立什么航空部的必要。我还投合陈的心理，慫恿陈济棠说：“空军非由总司令自己抓紧不可，绝对不要归中央，一归中

央，广东空军就必然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陈听了我的话十分高兴。以后，我在报上发表了一篇不主张扩大空军组织机构为航空部的文章，替陈济棠呐喊。

由于广州的国民政府宣告撤消，空军和海军两总部是否继续存在，当时就颇成问题。西南政务委员会成立初期，虽然对这问题没有讨论，但外界都纷纷推测海、空军机构会有所变动。张惠长和陈策当然不甘心再受陈济棠的统率，因此，就在海、空军内部散播空气，说海、空军军权应归中央，海、空军两总部的改组问题应候中央解决。那时孙科是行政院长，按照张、陈的想法，当然就是说要由孙科主持的南京中央来解决。他们把“西南”和陈济棠撇在一边。张惠长搞得更露骨，他在一月间就拟好一个空军誓不参加内战，不再为任何个人工具的通电稿，在空军内部发动各人签名。那时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一二八抗战的前夕，团结御侮呼声很高，张提出不打内战，当然谁也不能反对，因此大家（包括我在内）都签了名。这个通电在一月十七日发出，全国报纸都加以刊载，措辞是冠冕堂皇，其实张惠长搞这一套把戏，等于公开要求摆脱陈济棠的控制。这一来，张惠长和陈济棠之间的明争暗斗就发展到了高峰。

受蒋指使，炸飞舰艇

南京孙科政府上台后，为了欺骗群众，应付举国主张抗日救国的要求，曾高唱所谓“对日绝交”论调，但由于蒋介石、汪精卫把孙科政府只作为过渡的，不会让孙稳当院长，因此孙科政府就在“一二八”抗战前夕宣告垮台。孙科辞职后，对淞沪抗战表面上是热烈支持的，还打电报给西南两机关要求出兵支援十九路军，同时并电张惠长派飞机到沪助

战。为了配合孙科政治上的抗日姿态，张惠长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上也主张派机参战。陈济棠本身是不愿出兵的，但在輿論压迫下，不得不派出一些空军来表示“西南”的“抗日”。二月初，空军总部在张惠长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派我率领一队驱逐机（约十五架飞机）前往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我于二月十日率粤机队出发，抵达杭州后，曾几次配合南京空军对日机展开空战和轰炸敌军军事目标。不久我接到南京航空署的电令，要我们全队“即飞蚌埠集中，不必入南京”。原来当时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是不愿中日战事扩大的，他们不要粤机队到南京，也涵有怕引起敌人对南京骚扰的意思。我们奉令后即飞蚌埠，留蚌时间约有一个多月。三月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已开过，原已下野的蒋介石又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汪公开勾结起来。此时淞沪抗战已近尾声，上海的中日停战谈判正在进行。四月下旬，我在蚌埠队部已听说广东海空军有变动。有一天，忽接黄光锐来电说张惠长已离粤，接近张的人员也大部分离职，希望我能早日回粤协助空军机构改组的工作。我当时即派付队长谢莽飞回广州，向黄光锐表示支持他上台。不久就在报上获知西南政务委员会已于五月初先后议决撤消海、空军两总部，并派黄光锐为广东空军司令官。由于五月五日发表了中日上海停战协定，我们的援沪任务也算结束了。一天早上，蒋介石忽亲自打电话到蚌埠队部找我，要我立即飞京见他。（这是我到蚌埠以后第二次被蒋召见，上一次时间是在四月初，我见蒋主要是向他报告粤空军援沪的战况。）当天我飞抵南京向军委会报到，蒋的侍从秘书说蒋要我下午三时到陵园官邸见他。到时蒋在官邸左边大厅接见我，开头由我向他报告粤机队情况，他“勉慰”了几句以后就对我说：“广东现在发生事变，

陈策煽动海軍反抗政府命令，陈总司令（指陈济棠）有电給我要求調回你队，你队应立刻飞回广州协助他解决那些叛变的海軍。”蔣还強調軍紀必須整飭，絕不容許任何人加以破坏。我表示接受他的命令。告辞时蔣問我是否即返蚌埠，我說还要回安乐飯店取行李。蔣說：“你队明天回广州去好了，今天黃秉衡（航空署署长）会到飯店找你。”果然，不久黃秉衡帶了五千元大洋来，說是蔣委員長送給我的。当天我即返蚌埠，第二天率全队飞粵。抵广州时是五月中旬，那时空軍的改組問題已告解决。接近张惠长的人員刘植炎、杨官宇、邓粵銘、胡錦雅都走了，黃光銳已上台当粵空軍司令官。但海軍的一部分舰只和陈庆云的海軍陆战队却以琼州海口为根据地，抗拒改組命令。我回广州不久，海軍中有一刘开坤（好似是海軍学校教育长，我在德国时与他認識）曾秘密找我。他带来一封孙科的亲笔信，内容是劝我把空軍飞走，还说即使不走，也不要和海軍为难，同时还給我一张五万元的支票。我当时不肯接受，事后我把孙科的信拿給陈济棠看，陈因此以后对我更加信任。他提出要空軍协助陈汉光旅渡海接收海口，我主张对駐海口的飞鷹、福安等舰和秀英炮台、海軍行营进行突击性的空袭。七月四日，我奉命率机五架前往执行任务。五日飞鷹舰被炸沉沒，海口市各預定襲炸目标均中弹。經此突袭，海軍方面停止抵抗，陈汉光旅順利渡海完成接收任务。陈济棠为了搞賞我的机队，曾拨出五万元毫洋的奖金。由于半年前我曾列名空軍通电誓不参加內战，这一次却和海軍发生內鬩，还炸沉飞鷹舰，当时海內外輿論对我大有責难，（以后我到美国也受到华侨的質問）。这一事件今天回忆起来，深感遺憾。

“西南”垮台，弃陈投蒋

我在广东空军和黄光锐相处很好。陈济棠对我也很信任。一九三三年春，陈还派我和黄光锐、梅龙安、张子璇等到美国考察航空事业。在我们动身赴美之前，黄秉衡（他早已卸任航空署署长，改任国府参军）忽抵广州。他是空军袍泽，和我也有点交情，在空军人员公饯他的第二天，我约他到我家吃饭。席散之后，别的人都走了，他还不走，一直和我谈到清晨一时。他告诉我：“我们听说你快要到美国去，委座（指蒋介石）有信给你。”我接信一看，内容除一些客气话，“勉励”我要为祖国好好服务之类外，同时还附了一本电报密码给我。黄秉衡跟着对我大谈国内外形势，大意说：

“十九路军在福建搞人民政府已垮台了，目前中央兵力十分雄厚，已开始向两广方面施加压力。国际方面，德、意、日三国轴心已形成，这对我国有利。复兴中国一定要靠德国技术援助，今天德、意两国都派来不少优秀的将领到我国当顾问，协助我国训练军队，你是留学德国的，委座对你期望甚殷。他的意思要你不必到美国去，应该留在广东俟机抓住空军。”经过黄秉衡这样再三劝说，我只推说还要考虑，一时未能作出决定。以后我把黄这一番话告诉黄光锐，黄光锐说：“黄秉衡的话不足信，蒋介石那里有兵力来搞广东？”我把蒋的信和电报密码交黄光锐转陈济棠。黄说：“这事情暂时不要报告陈老总，否则我们去美国不成了。”约两三周后，我和黄光锐等首途赴美，过沪时我曾见到黄秉衡，告诉他我已决定出国一行，目前一时还离不开陈济棠，请他谅解。黄听了没有说什么。我到美国游历了四个月便回粤。

以上是陈济棠垮台前，蒋介石暗中企图分化广东空军的

一段插曲。从此以后，我和蔣方面很少联系。两三年間总算死心貼地地替陈济棠工作。

一九三六年五月間，胡汉民突然在穗逝世，西南局面逐步变化，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搞“六一事变”，要求南京领导全国“抗战”，一时情势紧张，謠言甚盛。七月十六日陈济棠在广州宣布就任抗日救国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在此之前，就发生了黄智刚等七机北飞投蔣的事件。

（黄受戴笠收买，是戴通过陈策指使空校四期毕业生福建籍的陈振兴居間拉綫的。）北飞七机中有三架属于我率領的第二队，另四架属于駐从化的第五队。当时还有第六期甲班毕业的学员和飞行员也私自离队。这一事件，我事前毫无所悉，事发后自己正感突兀。一天早上六时，陈济棠突派宪兵一队包围我的队部，我被带到空军参谋长陈卓林的办公室。陈卓林把陈济棠扣留我的手令給我看，还說：“我們都是老朋友，现在是奉命办事，这次要扣留你完全是陈老总意思，与黄光銳无关，我們也不相信七机叛变是你主使的。我和黄一定設法挽救你。”我強調这事件与自己无关，还負气埋怨他們出卖老朋友。談話后我被押送广卫路宪兵司令部，扣留于值日官室。第二天黄光銳来看我一次，他指我出手拆他的台，我冷笑說：“我問心无愧，你們要怎样就怎样好了。”黄临走时問我有无欠別人的債，并說可以代我清还，意思是暗示我会被枪决。在被扣押期間，我曾分別打電話給陈維周和何肇（公安局长）要求他們彻查此案，以免无辜冤枉。陈維周以后（在我被释放前两天）曾到訪我一次，說事情可能出于誤会，很快可以解决。七月十三日下午六时許，陈济棠偕黄光銳到宪兵司令部，要我出大厅见面，宪兵司令利树宗也在座。陈济棠开口发言，情緒很沉重，他坐在我左边，說

話時用手搭着我的椅靠。陳說：“這次扣留你是出於誤會，但也難怪，走了那麼多飛機，你自己也有責任，過去我當連排長，發生了逃兵事件，也曾受過處分，軍紀就是這樣，不能怪誰。今天我特來接你出去，以後你和光銳要團結好，不要鬧意見。”我當時很懷疑黃光銳有意搞鬼，因此說了些負氣的話，我說：“要飛走何必只走三架，難道不會帶全隊飛走么？”此外我還當着陳濟棠的面質問黃光銳，問他有沒有把一九三三年出國赴美時黃秉衡交給我的那封蔣介石密信和電報密碼轉呈陳濟棠，黃光銳當時很窘，陳濟棠也沒有說什麼。我和黃光銳同車離憲兵司令部，回到家里，才知當天陳維周送了一萬元毫券給我。第二天，我向黃光銳提出辭職。

七月十六日的晚上，黃光銳忽來電話要我到東山貓兒崗他的住宅晤談。見面後，黃光銳對我說：“過去的事不要提了，目前時局很緊張，各方面都有騷動，你大概知道了吧。目前空軍方面你以為應該怎麼辦呢？”我心想這家伙又來試探我了，因此就反問他怎辦。黃說：“還是走好了，大勢已去，留下來也沒有希望。你被扣留過，離廣州暫避一下也好。”我當時對他表示自己已辭了職，走不走無所謂。十七日早上，我到空軍司令部，那時情景很冷落，好些人都不在，只遇見陳卓林，他神色很慌張，把我拉在一邊談，要我自己取一飛機飛香港。我對他表示不願走。陳說：“現在是風水尾了，還是走吧！”我心里想，鬼才相信這些家伙！回家後的當天下午，第二隊全體隊員約二十多人都到我家，他們對我說外邊情況不妙，空軍司令部已禁止飛行員出入，電話綫亦被截斷，大家都準備逃走，問我的意見怎樣。我那時半信半疑，大家迫我表示態度，我只好說自己已經辭了職，大家留或走可跟大隊，多數決定。我隊隊員散了之後，自己

想来想去，結果决定立即买船票走香港。当时为了避开别人耳目，临下船前我到欧阳慧聪医师那里搞了一些药膏胶布贴在面上，上船后便躲进厕所，直到船过黄埔才回到房間。当天深夜十二时抵香港，翌晨报纸已登出我逃到香港的消息，連我住告罗士打酒店的房間号码也发表出来，很使我吃了一惊。那天我到九龙車站接家眷，在站上遇见不少空軍人員，大家告訴我：全部飞机和飛行員十八日那天北飞走了。胡汉賢（广东航空学校校长）也在人丛中出现，他告訴我：“老丁，光銳找你好半天，你即到 he 家里开会吧。”原来黃光銳和陈卓林、胡汉賢、吳建文等于十八日駕机逃到香港了，但报上发表的黃領銜的反对陈济棠的“巧”电（十八日）还说：“巧日督飭全軍集中韶关待命”哩。（陈济棠得悉空軍北飞后，即于十八晚宣布下野，乘英舰逃香港）当天下午二时我到九龙太子道黃光銳家，那时陈卓林、胡汉賢等数人已在座。陈卓林說：“南京方面每机奖二万元，怎样处理呢？”大家說：“我們要走也是为了国家統一，并非为了金錢。”我初时听了还弄不明白，后来黃才說出来：当我被扣留期間，陈卓林曾到过香港，他当时找到特务头子戴笠，向戴提出要求以两万元港币为每一飞机飞走的代价。陈和戴暗中商定了这一笔买卖，不但全体飛行員事先不知道，連黃光銳本人也被蒙蔽。当时在座各人都反对接受蔣的金錢。談到下午四时左右，戴笠和黃惠龙（前孙中山先生的随从副官，曾任广州国府參軍，广州国府撤消，黃即跟孙科入京。）来訪黃光銳，我們大家就轉到楼上坐，让黃光銳和戴笠二人在一起商談。以后黃光銳告訴我們，那天戴、黃二人帶了二百多万元港币来，但他已拒絕接受。听说以后陈卓林却单独向戴笠要錢，蔣介石当时很不高兴，結果还是給了陈二十万元港币，